



女人五十

苏川◎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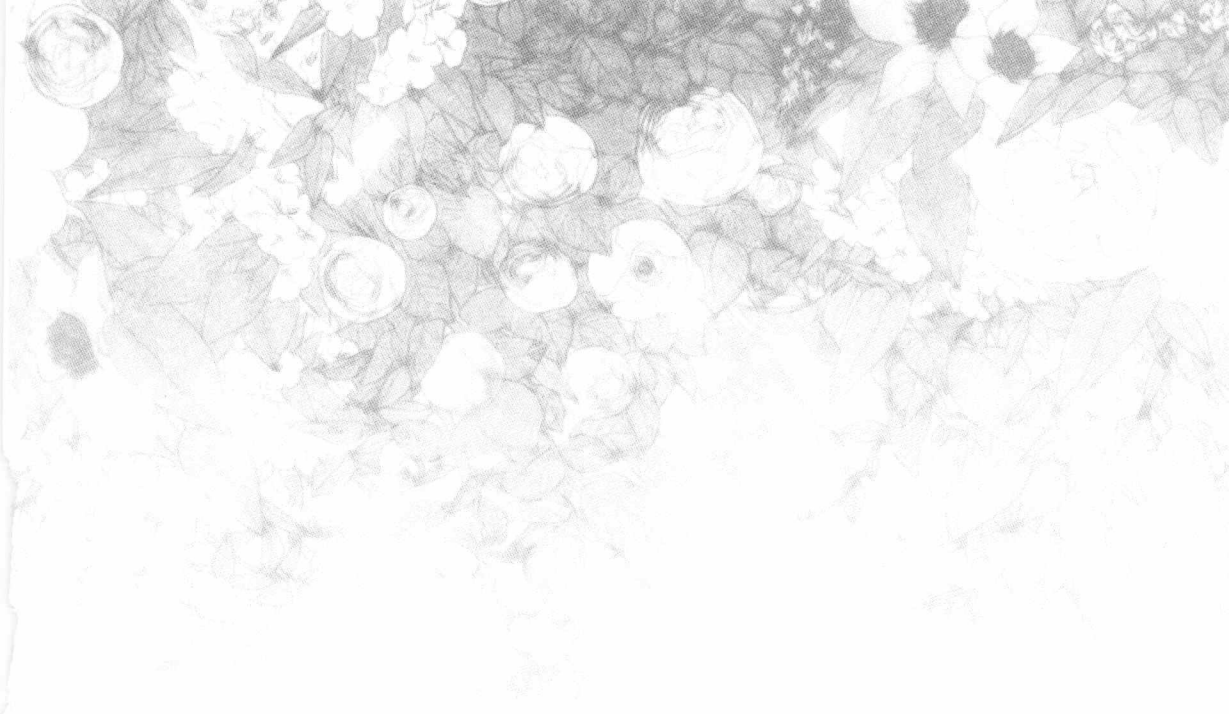
THE WOMAN AT FIFTY

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也是一段中国的历史。
如果让我选择，我不要来到这个世界，因为它带给我的不是欢乐；
如果离开这个世界，我会依依不舍，
因为幸运之神改变了我的命运！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女人

安徽文艺出版社

苏川◎著

五十

The Woman 50 Years Ol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五十 / 苏川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 - 7 - 5396 - 3288 - 9

I. 女…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1691 号

女人五十

苏 川 著

责任编辑: 刘 哲 吕冰心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合肥芳翔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21.25

印 数: 8,000

字 数: 350,000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6 - 3288 -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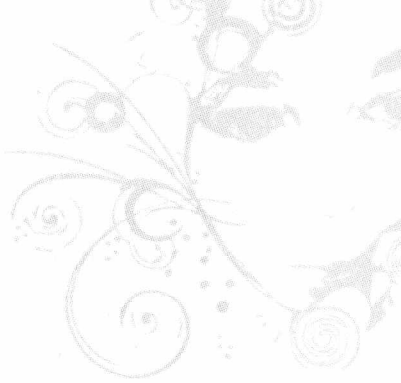
定 价: 3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写人生”的社会小说，作品通过一个中国女性五十年的人生成长经历，投影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本世纪初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描绘了这期间由政治运动到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普通百姓命运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以及城乡政治经济生活发生的巨大变革。在重重磨难中走过来的女主人公，将命运的不公和生活的困厄，化作一种自强、坚韧的力量，从乡村到城市，从临时工到大学老师，从“小黑屋”到温哥华的大别墅，她以自己在逆境人生中的善良、乐观和不屈，书写了一曲女性人生的奋斗史。

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娓娓道来，亲切自然，既有历史的厚重、文化的碰撞，又有哲理的思考、细腻的情感，朴素而悠远，平实而意长，是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的“浮世绘”。



父亲虽有众多的追求者，却最终选择了母亲。母亲并不爱他，但她心里明白，很多女生正在追他，他能看上她，是她的荣幸。



小时候，我常在梦中看到母亲那模糊的身影、模糊的脸，当我拼命想抓住她时，却怎么也抓不着，那身影总是离我远远的，忽而又不见了。醒来后，我对梦里的情景记得一清二楚。我好想赶快睡着，接上前面的梦。我一定要抓住母亲，求她留下来，永远不要离开我们。说来奇怪，当我一闭上眼，那梦又来了，而且总能接上。我又看到母亲那模糊的身影。当我伸长手臂去抓她时，突然狂风大起，乌云翻滚，一群怪模怪样的人举着弓箭向我冲来，吓得我对父亲大叫：“他们来了……又来了……快跑啊！”我一边跑一边往后看，母亲的脸终于出现了，她的样子像魔鬼，我失望极了。

父亲总在这时叫醒我，拍着我的背说：“丫头，又做梦了。什么东西又来了？别怕，爸爸在。”

我被梦里的情景吓出一身冷汗，惊魂未定地对父亲说：“我看见好多人追来，差点被他们抓住，母亲也在里面，她的样子好可怕！”

“那是梦，不是真的。”父亲安慰我说，“连我都不知道你母亲在哪里。她不会想起我们，你也不要整天想着她。快睡吧，天亮就好了。”

父亲曾经是一位军人，由于打仗勇敢，多次立功，二十岁被任命为中央警卫连指导员。他为此非常自豪，因为每天都能见到进进出出的中央首长。一九五〇年，父亲转业到重庆地质局当保卫处长兼建筑工程学校政治指导员。当时母亲是那里的一位穷学生，吃饭、穿衣靠政府救济。因为外公是国民党二十二军的高级将领，在一次战役中打了败仗，被共产党俘虏。听说他当团长时，蒋经国还是他手下的一名坦克营营长。外婆家是大地主，他们在乐山地区拥有大片土地和房产，靠收租和开旅馆为业。但母亲说，她小时候

在外婆家没有好东西吃,因为他们有了钱就知道买房、买地,自己不会享受。解放后,他们的财产被政府没收。还有一些值钱的东西藏在夹墙和瓦缝里,当地农民就把他们的房子拆掉,挖地三尺,找出来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

那时母亲虽然穿着一身布,却挡不住她那优美的线条和高雅的气质。她能歌善舞,是学校的文艺骨干,父亲很快被她吸引住了。当时很多女学生追求父亲,因为他长得帅,身高一米八〇,又是革命功臣。这在当时是一种时髦,像后来八十年代找大学生,九十年代找经理那样。很多军队干部由于忙于打仗,耽误了婚姻大事,革命成功后又帮助地方搞建设,因此在个人问题上,不但受到组织的关注,也引起很多女学生的倾慕。她们不顾年龄的差距,主动以身相许。

父亲虽有众多的追求者,却最终选择了母亲。母亲并不爱他,但她心里明白,很多女生正在追他,他能看上她,是她的荣幸。只是,她不想这么早谈恋爱,也没觉得他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可是,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如果选择了父亲,既可脱离贫困,又不会再被人歧视。虽然他比她大十岁,但外表好,又是共产党的优秀干部,所以,在父亲的追求下,她嫁给了他。

他俩结婚时,外公还在监狱里。母亲给外公写信说,她幸运地嫁给了一位共产党的优秀干部,从此有了依靠。

母亲从学校毕业,分到父亲的单位搞行政。她留在了大城市,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父亲经常出差,有野外津贴,每月的钱用不完,母亲就把多余的钱帮助她的家人,使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父亲对母亲十分疼爱,把她当孩子看待,只要他在家,什么事都不让她做。他经常骑着单车,到郊区买新鲜的蔬菜亲自做给她吃,邻居们见了十分羡慕。母亲觉得很幸运,没过几天苦日子,好运就来了,老公把她捧在手心,对她百依百顺,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一九五六年十月,我幸运地降生在这个温暖、和睦的家庭。由于父亲是江苏人,母亲是四川人,于是便给我取名江川。父亲总爱亲昵地叫我川儿。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父亲请了两个保姆,一个煮饭,一个照顾我。这件事在单位引起非议,有人说父亲忘本,也有人说他为了讨资产阶级小姐的喜欢,丧失了共产党的原则。其实,父亲打仗出身,过惯了朝不保夕的日子,无

数次的九死一生,使他对钱看得很轻,对妻子女儿看得很重,为了所爱的人,他甘愿付出一切。

小时的我长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脸,眼睛特别大。父母下班常常找不到我,因为早被邻居们这家抱到那家地玩去了。

可惜好景不长。在我刚满七个月的那年夏天,舅舅突然来到我家。他是母亲唯一的弟弟,也是小时候最欺负她的人。外婆生了四个女儿,终于盼到这个儿子,把他宠坏了。舅舅从小就霸道,整天穿一套国民党的军装,腰挂大刀横冲直撞。几个姐姐到城里读书去了,只有母亲和舅舅在家,因此,母亲成了他的勤务兵和出气筒,他去哪里,她也必须去。他胆大包天,什么坏事都敢做,搞得周围鸡犬不宁。他什么东西都敢吃。夏天,他在树下烧把火,把树上的蝉子熏下来烤着吃;秋天,他像猫似的到处抓老鼠,然后在河边挖个洞,架几根树枝,把老鼠放在上面,用火烤来吃。如果母亲不吃,他就打她。后来母亲走了,家里的房子、田地被分了,他再也威风不起来了,只好跟外婆在乡下夹着尾巴做人。

母亲听说舅舅在乡下很受气,答应让他留在城里读书,还叫保姆买了一个大蹄膀招待他。我坐在摇篮里看大人吃东西,馋得口水直流。舅舅觉得好玩,给我吃了几块肉皮。到了晚上,我就开始拉肚子,一连拉了好几天。母亲为了陪舅舅,没有带我去医院。直到第四天傍晚,母亲看我昏迷不醒,才吓坏了。保姆说,她看见舅舅给我吃了几块肉皮,可能不消化。母亲赶紧通知单位,用车把我送到医院。医生怪她为什么不早来,说这孩子早就脱水了,已经没救了,只有等着抬停尸房。

母亲吓呆了,哭着求医生:“她还没有死,求求你们救救她!你们要抬,就把我给抬进去,绝不是孩子!”

医生摇摇头,在过道上放了张小床,让我睡在上面。母亲在我肚子上揉啊揉的,整整揉了一个晚上,一边揉一边哭。她知道父亲多么喜欢我,如果我就这样死了,他一定不会原谅她。她忘了疲劳和饥饿,一心盼我醒过来。她宁可替我去死,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被抬进停尸房。眼看天快亮了,我仍然双目紧闭,一动不动。母亲心急如焚,几乎要绝望了,但她没有放弃,还是不断地揉。

那层楼里的护士和病人家属看她一直在那里哭啊揉的,时不时过来看

一眼,然后摇摇头,叹口气走了。

过道里的电灯熄了,外面的光线穿过走廊尽头的窗户,照在我的脸上。这时,母亲忽然发现我拉了一点大便,眼皮动了一下,她高兴地叫道:“医生,快来呀!孩子有救了……”

医生看我果真醒过来了,赶紧输液抢救。

这件事情轰动了整个医院,大家纷纷跑来问母亲要我的照片,说这孩子命大,将来一定有福。

舅舅在我住院的第三天悄悄溜走,去了成都的大姨家。他没想到会惹出这么大的祸,差点送了我的小命。

不幸的是,我刚脱离死亡,又遇到危险。一天,有位专家来医院视察工作,院长陪他巡视病房。这位专家走到我的床前,见我脸色不对,马上给我检查,发现我的大腿根部肿得厉害,赶紧叫人送手术室。他厉声对照顾我的护士说:“你是怎么搞的?药水没有输进去都不知道?肉都烂到大血管了。”这位专家亲自为我动了三个多小时的手术。我又得救了。过后,医院开除了照顾我的护士,并派专人为我调配饮食。

父亲出差在外,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母亲怕他担心,让单位保密。局长为此派了一辆吉普车,每天接送照顾我的人,因为单位在江北,而我住在当时最大的西南医院。父亲在我出院的前两天才回来。他赶到医院一看,一个胖乎乎的、活泼可爱的孩子瘦得皮包骨,一副可怜相,怎么逗都不笑,好像不认识他。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从此,父亲与舅舅结下仇恨,不准他来我家。他埋怨局长不及时告诉他,说组织上对他关心不够。局长不太高兴地对父亲说:“是你爱人要求保密的。我们已经尽力了,单位上唯一的一辆吉普车整整跟了她们一个月!”

父亲在家没住几天,就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半年。他从党校回来那天,局里正在召开群众大会。他放下行李,兴致勃勃地跑去参加。局长见他回来,请他谈谈在党校学习的体会。

他问局长:“党员可不可以鸣放?”局长说:“当然可以。”于是,他谈了一通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在党校学习的体会。台下群众不断为他鼓掌,对他的言论表示赞同。他以为,共产党员就要响应党的号召,随时随地要以党和



人民的利益为重。在他的内心深处,党就是他的再生父母,他的一切成就都是党培养的结果。没有党,就没有他的今天,只要对党有利的事,哪怕刀山火海他也敢上。

时隔不久,局里召开群众大会,主持人首先宣读文件,然后说:“根据部里收集的材料证明,我们局里有五位职工有严重的‘右派’倾向。他们身为党员,却利用鸣放,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这种反党、反革命的行为,如果不及时纠正,必将给党和人民带来严重恶果。所以,上级决定将他们开除党籍和公职,送原籍劳动改造。他们是保卫处长周德仁、人事处副处长张××、劳资科副科长盛×、宣传科长王××、职工代表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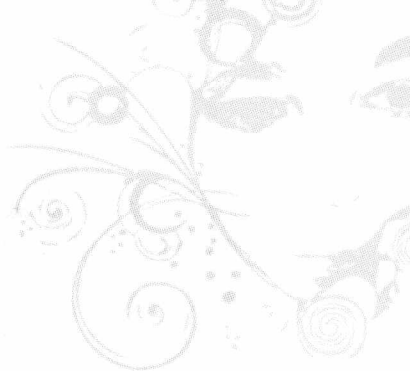
除父亲以外,其他几个被点名的人当场站出来找局长评理,说他们是冤枉的。身为党员,他们有权利阐述自己的观点,有义务向党提出建议,这是党章规定的。为什么把他们定为“右派”?还要送去劳改?这不公平!是故意整人!可是局长说,这是部里的决定,他无能为力,有意见可以找上级反映。

父亲做梦也想不到,一次发言竟然落到如此可悲的地步!他带着失望和沮丧的心情回到家,一股怨气直冲脑门。他打开那只跟随他多年的旧木箱,翻出一个精致的肥皂盒,倒出十二枚金光闪闪的勋章,看了一遍又一遍,嘴里念着:“这是淮海战役,这是……”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那是多么地残酷啊!这些勋章是用鲜血换来的!早知今日,不如当初死在战场!他宁愿死在敌人的枪炮下,也不愿意被……这些勋章留有何用?他颤抖着双手,将它们抛出窗外。他的心在流血,脑子里一片空白。

被打成“右派”的父亲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他就像个迷路的孤儿,失去了人生的目标。母亲做梦也想不到,没过上几年好日子,就跟着父亲倒了大霉。她原以为父亲的事和她没有关系,结果也被强迫离职。她只有二十岁,人生之路才刚开始,就要到农村陪他过一辈子。她不敢想,也不甘心。她不想去,可又有身孕在身,到时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只好走一步算一步,把孩子生下再说。她当初和父亲结婚并不是真正爱他,只是环境所迫,前途渺茫,找个靠山总比没有好。尽管将要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她并没有意识到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母亲从小受家庭的影响较深,虽然不再是昔日的五小姐,但并没有忘记往日的风光。那种灵魂深处的东西,不是环境能改

变的。她不会像穷人的孩子那样逆来顺受,也不会为一个男人牺牲一切。哪怕父亲对她再好,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他过苦日子。所以,母亲对丈夫的遭遇只有责备,没有安慰,反而说他害了她,葬送了她的前途。她从那时起开始怨恨起父亲。

父亲觉得对不起母亲,但又无可奈何。他也想自己的前途似锦,想让母亲过好日子,可是风云突变,只能随波逐流,听天由命。父亲强忍悲哀,一会儿向她认错,一会儿像哄小孩那样对她说:“我们家乡靠近上海,不是太穷,每天有花生米吃,还有海里各种各样的鱼虾。到时再养一百只鸡,给你坐月子吃……”



母亲把父亲忘得一干二净。虽然她没有提出离婚,但知道那是迟早的事。她说,她和继父是命中注定,因为算命瞎子说,她将来要找个背书包的。

2

父亲回到当初雄心勃勃参加革命的地方。他离开家乡江北二十年了,那里的一切在他眼里仍是熟悉而亲切的。一条条小河看不见尽头,河里的水清澈见底,河边长着密密麻麻的芦苇。社员们戴着草帽,三五成群地在田里耕作。那里四季分明,一马平川,土地肥沃,种什么长什么。解放前,因为人多地少,种出的粮食得先交租交税,剩下的按人头分配。如果风调雨顺,老百姓勉强填饱肚子,一天也只能吃一顿干饭。遇到天灾,即使每顿喝稀饭也不够,底子薄的人家只好出去要饭。那里和上海虽然仅一江之隔,但地处江北,发展缓慢。于是就有很多男人跑到上海拉黄包车、当学徒工,干最低贱的活。上海人也因此看不起江北人。

不知真相的奶奶以为父亲带着老婆、孩子回来看她,高兴得合不拢嘴。父亲的几个哥、嫂,还有侄儿、侄女也带着孩子来看他们,给他们送来鸡蛋、红糖。母亲拿出糖果、点心招待大家。奶奶屋里很久没这么热闹了,大家有说有笑,夸母亲年轻、漂亮。

父亲悄悄对母亲说:“你看,城里人不理我,咱农村人可不这样。人说‘无官一身轻’,我现在是彻底自由喽。”

几天后,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对父亲的处分决定,要他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从此,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大人小孩都知道他是“右派”分子,就连父亲的哥哥、嫂嫂也向他们投去鄙视的眼光。

这下轮到母亲说话了:“看到了吧?农村人和城里人没什么两样!”

从此,父母和大家一样,天刚蒙蒙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干活。我们那里天亮得早,早饭前得干几个小时的活,直到太阳高出树顶才回家吃饭。吃完饭

再去干活,直到天黑。回家还要种自留地、带孩子。平常吃的酱油、盐巴,全靠拿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到镇上去换钱买。谁家自留地种得不好,日子就难过。

那里的人家虽不富裕,但住的都是瓦房,只有猪圈和厕所是用芦苇和稻草搭起来的。所谓厕所,就是在粪坑上架两根木条,再在木条上钉一块木板。厕所没有门,只有三堵墙。如果你在上厕所,过往行人眼睛都不用斜,就能把你的屁股看得清清楚楚。人们习以为常,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害羞,还一边拉屎一边聊天。

母亲很不习惯,她哪敢在光天化日下当着外人的面“脱裤子”,只好在家用马桶。可是出去劳动,离家很远,无法回家用马桶,她只好红着脸找个没人的地方方便一下。她听不懂那里的话,别人也听不懂她的话。她只能像哑巴那样和别人交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虽然农活学起来不难,但一天干下来又枯燥又累,更何况她还挺着个大肚子,比别人更吃力。她手上的水泡磨破一个又一个,疼得钻心。一双原本细皮嫩肉的手,被搞得粗糙不堪。她想不通,为什么男人犯了错,女人也要跟着受惩罚?她觉得抬不起头,但又必须面对眼前的一切。她很苦闷,只想着早点把孩子生下来,尽快离开那里。

农村里的女人都是忙到孩子生下来才休息。也许她们命贱,没有人有反应期,生孩子就像母鸡生蛋那么容易。虽说生孩子是件痛苦的事情,但一想到“坐月子”,她们就很乐意吃这个苦。因为痛苦一阵,可以享受一个月,吃到平常吃不到的东西,比如鸡蛋、油面。人们不考虑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负担,也不考虑孩子的将来,只想多一口人就多一份粮食。过去,有些女婴一生下来就被扔进马桶里,然后随便找个理由,说什么“夜里发高烧,不知道孩子生下来了,第二天倒马桶才发现”。总之,一个孩子还没有一头小猪值钱。谁家死掉一头小猪,倒会心痛几天,弄死一个孩子,却不当回事。这就是现实生活,人穷到一定的地步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母亲每天吃着麦子饭,喝着玉米粥,嚼着腌黄瓜,每每回忆起过去的生话,就后悔当初花钱太奢侈,想不到会有落难的一天。看到市场上活蹦乱跳的鱼虾,她不能买,因为剩下的钱还得留着坐月子。她深深地体会到,虽然父亲对她百般体贴,但是没有钱还是不行,她不可能一辈子过这样的日子。

好不容易熬到生孩子,她以为不用下地劳动了。想不到还没满月,生产队长就催她去干活,说她不能享受贫下中农的待遇。十二月间,母亲穿着单薄的夹袄,顶着寒冷的北风,在地里收割残余的棉花。尖硬的棉壳把她的手背划出一道道血迹,她忍着疼痛,却忍不住眼泪。大家见她流泪,多少有点同情,明知她听不懂他们的话,还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别难过了,慢慢就会习惯的。”“下次多穿点衣服,月子里要保暖。”“以后戴个手套就不会把手戳破了。”她的苦闷一天天加深,恨不得插上翅膀,远走高飞。

这时,又一个打击接踵而来。上面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家乡那一带属于前线。上级要求对“地富反坏右”分子严加防范,不准他们乱说乱动。父亲随民工到海边修大坝,母亲同“五类分子”的家属关在大队部学习文件。我们家的房子被大队占用,用来训练民兵,我和刚出生的妹妹只好由奶奶照顾。

为了纪念在重庆的日子,父母给妹妹取名江渝。可能母亲怀她时心情不好的缘故,她一生下来就很丑,眼睛像哭肿的样子,鼻子扁扁的,嘴唇厚厚的,比我难看多了。不过,大姨对妹妹很感兴趣,希望母亲把妹妹送给她。大姨结婚多年没有生育,想到我父母落难,多个孩子多个负担,不如送一个给她,总比领养外人的好。

母亲很愿意,一是送给自己姐姐,二是给孩子一条出路。但是,父亲拒绝了大姨的好意。他说,再穷也不能把孩子送人,一家人无论如何也要在一起。

母亲最受不了的是他们把她和“五类分子”关在一起,每天吃窝窝头、喝酱油汤,还要谈思想、做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是罪人。她觉得自己没有错,就算丈夫犯了错误,她是清白的,为什么硬要给她扣帽子?可是,那些民兵根本不听她解释,对她横眉竖眼,凶神恶煞。她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受过这种气。她实在待不下去了,想偷偷逃走,可是没有钱。她在心里埋怨父亲,当初叫他省一点,他偏说坐月子重要,养不好会影响一辈子。

在母亲坐月子期间,父亲天不亮就到镇上买最新鲜的鱼、虾,亲自做给她吃,来回要走十八里路,还要饿着肚子出早工。他累得吐血,还瞒着母亲。奶奶心疼地说:“老五,以后你把东西买回来就去吃饭,我来做。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她们怎么办?”父亲说:“你做的不合她胃口。我没事的,老毛病,

别担心。”

一天傍晚，天上飘着鹅毛大雪。父亲赶了五十里路，到家像个雪人似的，手脚都冻僵了。他说海边太冷，回来拿条棉裤。奶奶对他说，母亲被他们关起来了。他问关在哪儿。奶奶说在大队部。他便抱着我去找她，想接她回家住一个晚上。父亲万万想不到，他走了以后母亲也被关起来了。他们这样对待她，她肯定受不了。他原以为当农民就是干农活，既不用动脑子也不受约束，大不了日子过得苦一点儿，总比打仗强多了。想不到地方上的政策比大城市还要“左”。

值班民兵听说他要接母亲回家，恶狠狠地说：“不准回去，今晚我们有安排。”

母亲一听就来气，板着脸对那人说：“我要见大队长，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找大队长没用，这里我说了算。要不这样，边上有间小屋，去看看吧，反正不能离开这里。”那个民兵说。

父亲对母亲说：“那就去看看吧，明天一早我就走，将就住一夜。”

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他们找到那间小屋。母亲迫不及待地推开门，一股寒气带着猪粪的臭味直冲鼻子。她气愤地说：“这明明是猪圈，太欺负人了！”

按照父亲以往的性子，一定会过去把那人揍一顿。可是，他没有动怒，知道和那些人没道理可讲，把民兵打伤了，自己还得蹲监狱。更何况，现在是非常时期，他不为自己，也得为老婆、孩子着想。于是，他把我交给母亲抱，想进去看清楚再说。

父亲推开那扇裂了缝的小门，那门发出“嘎吱”的响声。他弯腰进去一看，后墙不到一人高，墙和屋顶不连。透过外面射进的光线，只见地上铺着高低不平的砖块，踩上去有点滑。顶上盖着干芦苇，上面全是蜘蛛网。角落里有两张长条凳，上面搁了一块木板，木板上有一堆稻草。看来，这儿曾经住过人，但也许是要饭的叫花子。他退出来，对母亲摇了摇头。

母亲吃力地抱着我，一边走一边说：“太不像话了！今天非找大队长不可！我要到公社反映！”

正在这时，父亲的二嫂来了。她听奶奶说父亲到大队部去了，怕他沉不

住气，和民兵发生争执，赶紧跑来找他。

按理说，二伯是上门女婿，而且已经去世，二伯母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情。可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虽然她的生活也不富裕，但是哪家有困难，她就会在哪里出现。父亲非常敬佩她，有事总爱找她商量。

二伯母从母亲手中接过我，轻言细语地对她说：“玉玲啊，时候不早了，今晚到我家去住。我们有间小屋，虽然是羊圈，另一边还算干净，你们将就住一夜，总比睡在地上好。”

母亲见到二伯母，好像见到久别的亲人，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掉。她哭着说：“他们不让我走！二嫂，你一定要救我，我受不了了……”

二伯母安慰她说：“玉玲啊，你别哭，别着急，嫂子知道委屈你了。你再忍忍，过了这阵儿会好的。我去跟那人说，你们在这儿等。”

过了一会儿，二伯母回来说：“玉玲，跟我回家，他同意了。”

那天晚上，母亲辗转反侧，一夜没睡。闻着羊粪的阵阵臭味，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看着缩成一团的父亲，想到今后的生活，她心灰意冷。这哪像人过的日子！她推醒父亲，坚定地说：“这鬼地方不是人待的，我决定离开，问大姐借钱。”

父亲很难过，他感到对不起她，可又舍不得她走。她走了，两个孩子怎么办？于是，他恳求母亲说：“能不能再等等？也许过了这一阵就好了，你走了，孩子没人管。”

“我在这儿也管不了孩子，反正老二已经断奶，就让妈帮忙看着。等我在成都找到工作，就把她们接出来，总比全家吊死在一棵树上强。”母亲坚持说，“我实在不想再等了，这样下去不死也会疯的。”

从那天起，母亲决定放弃父亲。她越来越觉得，无论是人还是地方，都不值得留恋。她给大姨写信说，如果愿意借钱，就把妹妹送给她。

父亲知道她受了很多委屈，只怪自己身处逆境，连个安身之处都不能给她，还有什么理由让她留下来呢？只是他做梦也想不到，她这一走就是永别，他对她的爱，再也无法延续。

大姨收到母亲的信，听她说得那么可怜，又愿意把孩子给她，赶紧寄了五十元。

母亲收到钱,激动得热泪盈眶。此时此刻,她真正体会到钱的重要,没有钱,就没有希望。不等父亲回来,她就毅然离开了我们。

奶奶站在后门口,一手牵着我,一手抱着妹妹,看着母亲远去的背影,伤心地流泪。看到母亲坐上二等车^①,她才转过身,看着两个不懂事的孩子,长长地叹了口气。

母亲怕大队找麻烦,她对奶奶说,如果有人问,就说她到县里办事去了。她走得那么急,头都没有回,生怕别人发现,把她抓回来。这个地方对她来说太可怕了,她死也不要回来。车轮压在碎石上,发出“沙沙”的声音;西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在割;树枝上的冰柱,在阳光的照射下,像一把把闪亮的匕首。水珠掉在头巾上,沁湿了她的头发。她的脚在抽筋,身体在哆嗦,两个小时的路程,比两年还要长。到了码头,她全身冰凉,舌头僵硬,话都说不出来了。

母亲蹲在候船室的角落里,像逃犯似的东张西望,生怕看到熟人。她过一会儿看一下表,恨时针走得太慢。她听不懂周围人在说什么,但总觉得他们的声音好像大队上的某某人在说话。

轮船终于离开了码头。大家都到舱里取暖,她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站在甲板上,望着远处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终于脱险了!这里的一切使她刻骨铭心,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当初,她还以为自己很幸运,找到一座靠山,一辈子不愁吃穿。想不到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政治风暴断送了她的幸福。她发誓,一定要摆脱困境,以后决不找当官的,根本靠不住。

母亲到了成都,暂时住在大姨家。她感到城里的空气好新鲜,地上好干净,不像农村,到处都是鸡屎鸭粪。她希望尽快找份工作,把孩子接出来。

那时候上户口比较容易。派出所听说她原来是地质局的,又是中专生,同意她在成都落户。

母亲很快找到了一份民办教师的工作,每月工资二十元。经过痛苦的挣扎,她很珍惜拥有的一切。她兢兢业业地工作,老老实实在地做人,脚踏实地,一切从头开始。

^① 二等车:当地一种专门拉人的脚踏车。

一天,姨爹下班回来,看到只有母亲在,便笑嘻嘻地说:“五妹,我给你买了双袜子,过来试试。”

母亲想自己穿,姨爹要帮她穿,她没有多想,把脚伸过去。可是她发现,她的手老在她的脚上抚摸,便对他说:“你怎么会这样?大姐看到会生气的。”

“我才不怕她生气。”姨爹毫不在乎地说,“她算什么——铁公鸡!这么多年,连个蛋都生不出来,还凶得要命。她居然想抱养你和‘右派’生的孩子。五妹,我喜欢你。不如这样……你帮个忙,反正她也搞不清楚,到时就说你的孩子。”

“你怎么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母亲气愤地说,“我的孩子你可以不要,但我绝不会干对不起大姐的事。你再这样,我就搬出去了。”

姨爹赶紧赔不是:“五妹别生气嘛,我只是开个玩笑。别往心里去,就当我没说,好不好?”

这时,大姨回来了。她听见姨爹的话,笑着问:“你们在开什么玩笑?”

姨爹收起笑脸,对她解释说:“没什么,随便聊聊。”

大姨递给母亲一封信:“你丈夫来信了,看有没有提孩子的事。”

母亲看完信对她说:“他提了,还是不同意。”

“你有没有告诉他?把老二给我,我每月给他寄生活费,他每年还可以来看一次孩子。”大姨说。

“这些我都说了。我还劝他为孩子的将来考虑,何况是给自己姐姐,可他硬说舍不得。”母亲解释说。

姨爹忍不住对大姨说:“你有没有搞错?你帮他带孩子,还给他生活费?平时你跟我买个馒头都要平摊,倒对那个‘右派’这么大方!我怀疑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关系?不然就是疯了。”

“我的钱爱给谁就给谁,关你屁事!”大姨一听就来气,“我要真跟他有关系,他巴不得把孩子送我。”

“总之,我不同意!”姨爹说,“你不能生,我能生,我要自己的孩子。”

“你和谁去生?除非我们离婚。”

“那倒不一定。”

“你想干吗?”大姨说。

“我不想干吗,只想要自己的孩子。”姨爹说,“你妹能替那‘右派’生孩